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9.05.007

黄河、赵丽娟：“多边贸易体制的嬗变与亚太经贸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5期，第82-91页。

HUANG He, ZHAO Lijuan, “The Change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nd the Path Selection of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and Trade Integration”, *Pacific Journal*, Vol.27, No.5, 2019, pp.82-91.

多边贸易体制的嬗变与亚太经贸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黄河¹ 赵丽娟¹

(1.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摘要：多边贸易体制对世界经济和贸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曾经作为多边自由贸易体制最初倡导者的美国开始走向了自由贸易的对立面，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从根本上制约着自由贸易宗旨的落实。多边贸易体制的变化必然对亚太经贸一体化的未来走向产生重大的影响。从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缘于对共同利益的追求，当存在经济动因和商业利益时，合作提供区域性经济类公共产品的动力就会更大。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与域内外经济体不断增长的经济联系决定了在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合作机制领域，中国将提供力所能及的区域性公共产品。

关键词：多边贸易体制；亚太自由贸易区；路径选择；区域性公共产品

中图分类号：D81/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9)05-0082-10

国际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在其《国家与市场》一书中对政治经济中的“权力”概念进行了相对性划分。她认为，国际社会主要存在两种权力，分别为联系性权力(relational power)和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联系性权力是指“甲迫使乙去做其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权力”，而后者则是指“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①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对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而言，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体现着不

同程度的重要性。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走向结束，基于自身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实力，美国开始利用战后重建机遇，逐步在全球布设其结构性权力，并形成了一系列符合本国利益要求的国际制度安排。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经济增长出现颓势。此次危机产生的消极情绪持续弥漫在美国经济的诸多领域。在其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重重压力之下，曾经作为世界多边自由贸易体制最初倡导者的美国开始走向了自由贸易政策的对立

收稿日期：2019-02-04；修订日期：2019-03-2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与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17ZDA042)的中期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黄河(1969—)，男，江苏无锡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赵丽娟(1991—)，女，河南许昌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

* 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①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家与市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9页。

面。面对国际形势的转变,美国贸易政策的重心也开始发生偏转;美国通过使用业已积累并掌握的结构权力,逐步利用美国国内法的模式干涉对外经贸活动。^①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理念和逻辑产生了根本性的质疑。^②而从二战后的世界经贸发展态势,尤其是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成果可以明显看出,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对于保障世界经济的增长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新时期多边贸易体制的变化必然会对亚太经贸一体化的未来走向产生重大影响,而亚太地区各国也将面临新的挑战、机遇及选择。

一、多边贸易体制的嬗变

多边贸易体制(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是相对于数量较多的国家或地区所进行的经贸活动而言的,具体是指为保障和促进国际贸易发展,一定数量的国家或地区通过谈判而制定相关规范、签订相关多边协议,以及建立国际性贸易机构,其重要特征是推动生产要素尽可能自由流动。狭义而言,多边贸易体制是指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所管理的体制。

二次大战之后,国际贸易秩序的恢复成为国际经济秩序恢复的主要内容。^③因此,构建世界贸易体系被提上了国际议程。各国通过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经济政策的反思,认为正是一战之后,美国对外竖起高关税和贸易保护的大门,各国也对美国采取关税报复措施,其中包括1921年和1922年美国分别制定的《紧急关税法》(Emergency Tariff Act)和《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The Fordney-McCumber Tariff Act)、1930年美国实施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等诸如此类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动与政策直接导致了世界贸易秩序的严重混乱和更大程度的经济萧条。^④由此而言,这使得世界经济的恢复存在着制度层面的两大障碍:其一是国家间的关税壁垒,其二是各国竞相贬值的汇率政策。为了克服制度性障碍,国际社会需要使用管理

手段来替代国内政府的管理手段,由此而推进形成了以关贸总协定(GAT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为代表的三大支柱。^⑤

在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根据上述多边制度安排而建立的世界经济秩序,在加强经贸联系、促进贸易自由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其中的黄金阶段(1950年—1973年),国际贸易得到迅速发展,约从620亿美元增加到5800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0%,超过了国际贸易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⑥发达国家之中也再没有出现20世纪20—30年代那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西方世界的政治格局相对稳定。有学者对此甚至提出了“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需要指出的是,多边贸易体制这一制度安排即本文开篇所阐述的“结构性权力”的重要体现。正如斯特兰奇所指出的,以国际惯例、国际规则和国际体制为代表的这一结构性权力“是构建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⑦在结构性权力的框架下,乔克·芬利森(Jock A. Finlayson)和马克·察赫尔(Mark W. Zacher)认为,多边贸易体制具有“影响扩散功能”(diffusion of influence)与“促进互动功能”(promotion of interaction)。这两种功能不但体现了自由经济原则和方式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扩散,还允许较小国家在开拓国外市场和管理

① 黄河、高辉:“美国与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7期,第24页。

② 屠新泉:“我国应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进全球贸易治理”,《国际贸易问题》,2018年第2期,第15页。

③ 科依勒·贝格威尔、罗伯特·W·思泰格尔著:《世界贸易体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④ 张斌:“多边贸易体制的变迁:一个国际机制理论的解释”,《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第53页。

⑤ 彭刚、胡晓涛:“欧美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格局调整”,《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年第1期,第196页。

⑥ 数据来自世界贸易组织官方数据库检索计算, <https://data.wto.org/>。

⑦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家与市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9页。

贸易壁垒方面具有较大的政策空间,^①从而推动世界贸易的共同发展。

由上述可以看出,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是漫长的,经历了一个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完整演变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多边贸易体制在其存续的前几十年历史之中,主要作用是调节西方阵营内部的贸易关系。其具体表现是,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约从1948年的36%下降为20世纪90年代的4%至5%。^②这在实际上大大促进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发展。美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发起国和领导者,而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正是美国霸权(American hegemony)的产物。纵观历史,多边贸易体制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它所表明的主旨之间还相差很远,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从根本上制约着自由贸易宗旨的落实。从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进程来看,把国内法律转为区域贸易规则、再通过区域贸易规则撬动多边贸易谈判是美国沿用至今的手法。对美国来说,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区域贸易集团能够为其在多边谈判中增加有力的筹码。^③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结果关系到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而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对国家的安全、发展、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作用。因此,美国参与亚太地区区域贸易集团的重构,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它意味着一国能“得到什么,如何得到”,而各国必须通过自己的能力来影响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走向。^④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世界体系从来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一直处于无休止的变动之中。称霸只是短暂的,一个国家一旦成为真正的霸权国,它也就开始了衰落,新的霸权又再兴起,而霸权的衰落和兴起会引发整个世界格局的巨变。^⑤1945年12月27日,《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s)生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正式成立,关贸总协定也得到广泛认可。美国依托这一系列“基石”建立起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霸权地位。1973年,因石油危机而造成的美元贬值导致了

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这一危机看似削减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体实力,但是在客观上缩小了美、日、欧三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三足鼎立经济格局的形成。同时,也为世界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埋下了伏笔。国际格局从“霸权国治下的和平”开始转向“多元合作下的和平”。冷战结束后,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大发展和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力量格局再次发生变化,国际社会出现了“逆全球化”趋势。^⑥当前的世界正面临全球化“逆转期”的各种摩擦与动荡,世界经贸格局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唐纳德·约翰·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就任美国总统后并未摧毁现存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而是试图利用“国内法干预模式”将其调整为两个不同的体系:一个是美国与其传统贸易伙伴之间的自由贸易体系;另一个是未被纳入这一自由贸易体系的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目前,这两个体系正在形成之中,其突出的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被边缘化,存在被美国放弃的可能性。在1995年WTO成立之后,虽然仍有大量贸易争端尚需解决,但多边主义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单边主义,WTO将原先的贸易范围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与此同时,美国很少借助“301条款”等措施进行直接的经济打击,这使得该条款的贸易措施基本上处于稳定的休眠状态。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重

① 贺平著:《贸易与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21页。

② 雷继唐、王文先、史学瀛编著:《关贸总协定与中国改革开放》,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1页。

③ 樊勇明等著:《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1-232页。

④ 湛柏明主编:《国际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页。

⑤ 樊勇明、贺平、黄河著:《贸易摩擦与大国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6-257页。

⑥ 薛澜:“全球公共治理:中国公共管理未来30年研究的重要议题”,《公共行政评论》,2012年第1期,第17页。

燃。特朗普上任后旋即签署行政命令,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等多边体制或区域体制也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在针对如何处理贸易摩擦这一问题上,美国重拾以“301条款”为主要代表的单边主义措施。^①例如,2018年4月3日,依据“301调查”结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建议对来自中国的价值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主要涉及信息和通信技术、航天航空、机器人、医药、机械等行业。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公然违背了世贸组织精神,已触及了WTO的核心原则,严重损害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与权威。^②

第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与现有多边贸易规则存在冲突。正如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一份报告所言,“自1995年以来,世界已经变化,但世贸组织没有变化。”第二轮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是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和扩展。其背后的推动力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国际投资进行的全球生产布局,在贸易上表现为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 GVCs)中间品贸易规模的急剧扩大。2001年11月,多哈回合贸易谈判(Doha Round of World Trade Talks)启动后,尽管一些成员提出了顺应全球价值链发展的谈判议题,但这些议题并未被纳入谈判,且在原有议题上至今未能达成一致。这使多边贸易规则与作为其经济基础的全球价值链发展诉求之间的冲突加剧,进而导致出现区域主义盛行和多边体制边缘化的趋势,并间接开启了世界经济再平衡进程。^③

第三,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系开始转向美国与其传统贸易伙伴之间的“双轨”贸易新体系。在WTO框架下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的大背景下,全球范围内的区域贸易协定(Region Trade Agreements, RTAs)安排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④目前,美国与其传统贸易伙伴之间已形成了多个区域贸易协定。2018年末,12月1日、12日,美墨加三国政府在阿根廷第13届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正式签订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nited States -

Mexico - Canada Agreement, USMCA)。^⑤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2018年7月17日,日本与欧盟双方签署了《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并于2019年2月1日零点生效。这意味着一个覆盖6.2亿人口,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贸易总额占全球近40%的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的诞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大搞单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大背景之下,日欧缔结的《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更加令人瞩目,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欧盟希望联合美国和日本以共同压制中国的战略考量也在增加。^⑥这使得日美欧贸易体系一体化经贸格局初显。^⑦可以明显看出的是,中国并不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朋友圈”,《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与中国无关,并且《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和《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涉及国家的经济体量均是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体量的2~3倍以上。这将一改20世纪末至今的全球经济与贸易格局,形成全球“双轨”贸易新体系。同时这也意味着美墨加、欧日将分别铸成两个自由贸易的巨型板块。

然而,目前全球经贸发展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正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着力推进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无理质疑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回忆两次大战之间的教训,现今如若其他国家效仿美国,这将势必对多边自由贸易体制造成

① 何力:“美国‘301条款’的复活与WTO”,《政法论丛》,2017年第6期,第3页。

② 凌馨:“中方认为美国‘301条款’挑战多边贸易体制”,新华网,2018年4月28日,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4/28/c_1122758775.htm。

③ 陈靓、黄鹏:“WTO现代化改革:全球价值链与多边贸易体系的冲突与协调”,《国际展望》,2019年第1期,第16-20页。

④ 张荣楠:“全球贸易发展或步入‘结构性冲突期’”,新浪财经网,2018年3月24日,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stockptd/2018-03-24/doc-ifysnev3995396.shtml>。

⑤ 熊洁:“USMCA的前世今生”,《中国投资》,2018年第21期,第81页。

⑥ 析华:“‘欧日经济伙伴关系’的战略机理及中国应对”,澎湃新闻,2018年12月10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23086。

⑦ 张季风、王厚双等:“关于日欧EPA的深度分析内容、诉求及影响”,《日本学刊》,2018年第5期,第1页。

致命性破坏,随之而来的不仅会是全球经济的大衰退,还有可能激发世界政局的强烈动荡。冷战后最终确立并不断发展的多边贸易体制将迎来最不确定的晦暗时期。

二、亚太经贸一体化面临的挑战

目前,亚太地区各种区域贸易安排层出不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正面临重叠化、碎片化风险。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统计,早在2013年,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便已超过100个^①,另外还有100多个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之中。^②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地区一体化涉及的国家数量相对较少,相比多边贸易谈判能够更好地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在面临多边谈判的僵局时转而醉心于双边或区域层次的谈判。^③其中,美国的转变尤为令人瞩目。随着综合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在冷战时期领导与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能力和意愿都出现了衰退。^④因此,亚太地区的经贸一体化进程面临着一定的困难与挑战,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亚太经合组织(以下简称APEC)成员间自由贸易协定大量产生,区域化逐渐向小型多边贸易自由化迈进。^⑤上述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和侵蚀了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及多边贸易体系框架。目前,在亚太地区,主要存在两个不同的区域自贸谈判,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此外,还存在着以东盟为主的各类自由贸易协定。它们彼此处于相互博弈并且缺乏协调的“竞合”关系之中,其效果正如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E. Baldwin)提出的“意大利面碗效应”。^⑥有研究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还发现,在亚太地区,随着自由贸易协定签订数量的逐渐增多,多重自由贸易协定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区域贸易增长效应,所以,并非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越多越好。^⑦麦肯锡的调查报告显示,大多数跨国公司受访高管认为,

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在过去几年里存在较大风险。^⑧在“意大利面碗效应”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发展的趋势之一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受制于生产成本的需要,其投资区位由过去的亚太地区等代工区域,转而让位给新进入的拉美、非洲等地区。

第二,APEC具有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包容了几个次区域组织,这是世界上其他区域组织所没有的。^⑨例如,当美国在多边贸易体制中未能获得预期的利益时,APEC就成为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实验基地。在APEC的各种磋商会谈中,发达国家就贸易自由化议题采取积极推进的行动,促使其他国家依照行动主张提高经贸开放度。但当多边贸易体制内的自由化程度超过APEC的相关规定时,多边贸易体制便会产生新标准,而这些标准又会成为APEC内发达国家成员针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苛刻要求。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利用自身的结构性权力对其他成员进行约束和限制。^⑩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要退出WTO,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区”,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这样的前提下,多边贸易体制被破坏,必然会引发各种经贸

① 亚洲开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约为109个。

② 李琮主编:《世界经济新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6页。

③ Paul Krugman, “Regionalism versus Multilateralism: Analytical Notes”, in Jaime De Melo and Arvind Panagariya, eds., *New Dimensions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58.

④ 贺平著:《贸易与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71页。

⑤ 张荣楠:“FTAAP或将主导亚太经贸一体化”,经济参考,2014年11月7日, http://www.jjckb.cn/2014-11/07/content_526582.htm。

⑥ Richard E. Baldwin, “Multilateralism Regionalism: Spaghetti Bowls as Building Blocs on the Path to Global Free Trade”, *The World Economy*, Vol.29, No.11, 2006, pp.1451-1518.

⑦ 钱进:“双边FTA是否成为中国发展亚太双边贸易的催化剂?”《求索》,2017年第11期,第54页。

⑧ 麦肯锡:“全球供应链将面临的挑战”,《商务周刊》,2011年第21期,第104-106页。

⑨ 盛斌:“区域安排和次区域安排:APEC面临的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7期,第44-45页。

⑩ 王孝勇、骆晓强:“经济全球化中的APEC面临的挑战及前景”,《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第65页。

对抗,这将导致为数众多的美国企业卷入其中,而最终无助于美国经济的提升。因此,美国的亚太经济战略,更重要的是从内部结构上进行改革,来推进世界经济结构的深度改革以及东亚区域合作机制的合理调整。^①

第三,随着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亚太经贸一体化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冲击。2018年伊始,特朗普频频向中国发出威胁,并于8月18日开始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自主创新进行“301调查”。^②美国《2018总统贸易政策议程》更是强调了“公平贸易”政策,着力打击“不公平贸易行为”。特朗普政府由此采取的一系列贸易措施,使全球贸易关系一时剑拔弩张。^③2018年前三个季度,美国开始对中国进口商品征税(7月份价值500亿美元,9月份又增加了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商品)。^④美国关税收入占进口总额的比重已从2015年的1.3%升至2018年10月的2.7%。^⑤同时,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政治风险大幅度增加。

第四,美国推行贸易保护政策引发亚太地区国家对美国承担区域经济稳定责任的高度不信任。2018年,11个国家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作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升级修订版,该协定于2018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此协定旨在通过削减、撤销关税和开放市场,促进亚太地区区域经济贸易整合。^⑥美国没有加入该协定,以至于该协定的贸易利益增进效应被认为有所下降。但是,该协定提供区域性贸易类公共产品的属性反而更加突出。其中主要原因是美国的缺席,反而避免了美国有可能再次将公共产品“私物化”的可能性。然而,无论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还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均存在负面冲击。只不过相对来说,后者带来的不利作用相对而言要小一些。因此,从一定角度上看,不论是“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一举动还是故意制造贸易摩擦,均是美国用以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而已。^⑦对于美国而言,在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中,其结构性权力才是

保证本国经贸良好发展的根本。在必要的情况下,美国也会利用联系性权力来直接敲打和警示潜在的竞争者,这也是其惯常选择。因而,对于亚洲新兴的市场国家来说,对美国存在一定的疑虑是不可避免的。

三、亚太经贸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中国于1991年加入APEC。作为中国加入的第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APEC为中国融入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构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格局打开了一扇大门。^⑧中国认为APEC应该通过市场力量驱动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并助推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⑨中国始终坚持以多边贸易为主、区域贸易安排为辅的立场。如果各类自由贸易协定自行其是,大搞歧视性与排他性贸易生产,这将必然造成全球价值链的彻底碎片化。^⑩

2012年,第21届东盟峰会上,东盟十国和六个对话伙伴国(即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新西兰)的领导人宣布启动区域全面

① 张蕴岭:“美国亚太区域经济战略解析”,《美国研究》,2017年第1期,第19页。

② 任靓:“特朗普贸易政策与美对华‘301’调查”,《国际贸易问题》,2017年第12期,第153页。

③ 孔庆江、刘禹:“特朗普政府的‘公平贸易’政策及其应对”,《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0期,第41页。

④ 科法斯集团:“美国贸易保护:已对贸易伙伴产生显著冲击”,《进出口经理人》,2018年第11期,第33页。

⑤ 刘璐天:“全球化放缓由何导致?又会带来何种变化?”凤凰网国际智库,2019年1月29日,https://pit.ifeng.com/c/7jqzAuevSrY。

⑥ 薛瑾:“亚太经贸一体化新协定CPTPP 30日正式生效”,第一财经,2018年12月30日,https://www.yicai.com/brief/100089640.html。

⑦ 杨利强、余松策:“从TPP到CPTPP:参与各方谈判动机与贸易利益变化分析”,《亚太经济》,2018年第5期,第63页。

⑧ 刘晨阳、王晓燕:“‘后茂物’时代的APEC进程与‘一带一路’建设”,《亚太经济》,2018年第4期,第6页。

⑨ 刘晨阳:“APEC进程中的‘中国脚印’”,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7年11月12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1112/c40531-29640830.html。

⑩ 张荣楠:“FTAAP或将主导亚太经贸一体化”,经济参考,2014年11月7日,http://www.jjckb.cn/2014-11/07/content_526582.htm。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该协定如果达成,将会形成一个占世界贸易总量30%的贸易集团,成为通往实现更大范围亚太自贸区的可能途径。^①从亚洲各个经济体主动或被动地专注于自身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建设来看,上述区域一体化的模式,都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现实推进路径呈现明显的多层次、多框架并存的格局。^②从功能上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有助于整合APEC内部现存的区域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RTAs/FTAs),从而增强APEC的发展动力。

为应对快速增长的亚洲国家间贸易碎片化的局面,2006年的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起草了一项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议,并最终写入2007年APEC领导人的声明之中。2011年的檀香山宣言确定了APEC成员国朝着一个无缝区域经济迈进的目标,并致力于“解决下一代贸易和投资议题”而扩大贸易。^③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亚太自由贸易区于2014年APEC北京峰会启动进程,由长期愿景变为现实行动。2016年,APEC批准了《亚太自贸区集体战略研究报告》,并发布《亚太自贸区利马宣言》。这是根据北京路线图制定开展的,进一步明确了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和原则,为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落地提供了全面的规划。^④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APEC岷港峰会期间进一步表示:“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是亚太工商界多年的梦想,我们应该行动起来,全面深入落实北京路线图,向着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目标不断迈进,为开放型亚太经济提供机制保障。”^⑤

从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当各相关方之间存在合作共赢的可能性的时候,合作提供区域性经济类公共产品的动力就会更大。^⑥历史上许多贸易谈判成功的案例充分表明,当区域国家间面临共同的问题时,会产生合作的意愿,这些共同的合作意愿促进了区域合作的发展。在国家层次上,当独立地提供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动力与意愿不足时,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降低协调成本,实现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⑦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正是基

于此而不断得以推进的。

中国的发展战略是保持经济增长,并在缓慢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解决许多国内经济与社会问题。总体上看,由于亚洲经济活动的相对活跃,中国的投放目标必然锁定在该地区。因此,中国能够对亚太地缘经济的运行施加强大影响力。^⑧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与域内外经济体不断增长的经济联系,决定了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轨道上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提供中,中国将扮演重要的角色。按照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说法,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预期的效应莫基于各方的利益认同和政策协调,只有这样,国际体系才能顺利运转。^⑨与许多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相比,在诸如减少多国协调的交易成本或达成关于优先议程的共识等问题上,提供有针对性、小型化的国际公共产品可能更加符合国际社会的需求。中国正在从经贸领域的公共产品入手,向国际社会提供富有中国特色的区域性制度安排。^⑩

这对于亚太地区的未来发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亚太地区的情况具有巨大的差异性,因此,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必须体现很强的务实性与包容性。2018年11月17日,习近平主席

① 马曹冉:“区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定部长级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新华网,2018年7月1日,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7/01/c_1123062943.htm。

② 张天桂:“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路径与推进策略”,《国际展望》,2018年第6期,第126页。

③ 陈淑梅、全毅:“TPP、RCEP谈判与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亚太经济》,2013年第2期,第7页。

④ 张天桂:“TPP—CPTPP、RCEP和FTAAP:中国的角色与作用”,《商业经济》,2018年第10期,第118页。

⑤ “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8年2月2日,http://www.catl.org.cn/2018-02/02/content_50391583.htm。

⑥ [西]安东尼·埃斯特万多道尔、[美]布莱恩·弗朗兹、[美]谭·罗伯特·阮著,张建新、黄河等译:《区域性公共产品:从理论到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⑦ 杨海燕:“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与合作机制探析”,《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5年第16辑,第33页。

⑧ 黄朝翰:“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济新秩序正在浮现”,《亚太经济》,2012年第5期,第6页。

⑨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9页。

⑩ 王联合:“美国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及其变化”,《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8年第22辑,第105页。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题为《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他指出:“亚太经合组织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先驱。我们应该着眼2020年后合作愿景,坚持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①

上述目标的落实,需要采取切实的手段和行动。积极提供区域性经济类公共产品,帮助落后国家实现能力建设,特别是设立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发展中国家人员培训等项目,促进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实施贸易自由化,这些均是实现亚太地区合作共赢的关键所在。^②根据桑德勒(Sandler)等人对公共产品供给方法的汇总,^③中国提供的区域性经济类公共产品属于“最弱环节”型,与日本“雁型模式”的供给侧重在“加权总和法”和“最佳表现法”是有区别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需要解决的是区域内的“制度合作薄弱点”,也就是通过多边机构为相关国家提供技术和发展援助,提高区域内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获取资金的能力(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提供亚太自由贸易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方法选择

供给方法	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条件要素
加权总和法	亚太地区多边体制的建构方案、多边金融机构或相对发达国家主导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激发区域内相关国家的行动意愿和行动能力。
最弱环节法	多边贸易体制、多边开发银行或为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提供筹措资金,加强区域内经济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敦促域内国家采取公共产品的提供方案,使得公共产品上升到可接受的水平。即使考虑在没有外部资金的援助的情况下,域内经济体也可以提供最弱环节的区域性公共产品。
最佳表现法	亚太区域内各国采用合作的方式,或者激励区域内的主导者,通过汇聚并整合区域内外资金和资源,以提高区域内贸易或治理类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规避集体行动的困境。
权重总和法	在小集团的区域行动中,鼓励多边开发银行等其他多边组织提供支持;增强国际机构的情报和资料的搜集的能力,鼓励独立融资的行为。

资料来源:陈辉、王爽:“‘一带一路’与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方案”,黄河、贺平主编:《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8年第22辑,第183页。

在具体政策实施方面,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MDBs)在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卫生医疗发展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更行之有效地参与到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中;保证各国的承诺和跟进政策协调方面达成共识,使得跨境基础设施网络得以运行。^④中国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SCODB)等资金平台。这些平台正积极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传统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实现功能互补,推动形成一个新的重要的国际融资及金融服务平台,为亚太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援,加速改善区域内基础设施的落后现状,最终促成互联互通“无缝亚洲”(Seamless Asia)这一美好愿景的实现。^⑤

需要强调的是,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推进原则要以包容性强的基础协议作为开端,制定可行的区域整合方案,分阶段达成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合作目标。一条可能的路径是“通过APEC内部区域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的无缝化整合,进而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值得注意的是,整合区域贸易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需要各方寻找利益平衡点,统一各领域规则和条款,最终达成一致决议。”^⑥研究表明,到2025年,覆盖整个区域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将产生

① “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8年11月17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11/17/c_1123728402.htm。

② 沈铭辉:“亚太自贸区:贸易新议题的新探索”,《国际经济合作》,2017年第7期,第15页。

③ Todd Sandler, “Global and Regional Public Goods: A Prognosis for Collective Action”, *Fiscal Studies*, Vol. 19, No. 3, 1998, pp. 221-247.

④ [西]安东尼·埃斯特瓦多道尔、[美]布莱恩·弗朗兹、[美]谭·罗伯特·阮著,张建新、黄河等译:《区域性公共产品:从理论到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⑤ 张汉林、张鹏举:“‘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建设国际金融合作体系研究”,《理论探讨》,2018年第2期,第91-92页。

⑥ 张天桂:“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路径与推进策略”,《国际展望》,2018年第6期,第132页。

1.92 万亿美元的收益并有效降低贸易投资的壁垒”。^①高质量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必然要求高水准的制度安排,这样才能保证在机制的弹性和张力的协调中提升区内成员的自我约束意识。这样一来,造福区内人民的具体政策实施才能得到保障,亚太经济合作一体化的目标方可最终实现。因此,尽早实现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集团化是亚太地区不少国家的长期以来的深切愿望。^②

从世界经济发展诸多历史经验及教训来看,维护能够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有效的集体努力,需要区域内各国竭诚合作,共同行动,将人类的共同知识和财富凝聚到地区的务实发展进程之中。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致力推进亚太地区的深化建设,必将有利于缓和当前国际社会消极政治因素的不良影响,进而有助于保障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稳定态势。这既符合亚太区域内各国的政治安全需求与经济利益诉求,也是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方向。

四、结 论

美国认为其国家利益在于保护整个西方的强大,为此付出一定经济利益是值得的。所以,美国凭借其战后的霸主地位,即便发现有的国家企图“免费搭车”、既享受自由贸易利益又保护国内市场,也不进行直接报复。^③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颓势不可避免,这使得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④美国的单边主义对脆弱的全球治理构成了严峻挑战,^⑤同时也在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不良的示范作用。基于上述的背景,建立广覆盖、包容性强的机制化安排的难点在于如下的深层次考虑:区域一体化为导向的自由贸易措施应该覆盖哪些产业领域;什么样的贸易政策最能促进参与区域一体化国家的内部经济增长;贸易政策的决定机制应该怎样以及在哪里被制定和执行。一个合理的区域贸易协定安排能够缓解当前“逆全球

化”所导致的经济的低速分化状态,确保市场的开放度。同时,一个符合区域经济增长并带来普遍福利的贸易制度安排必然能够在降低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时刻发挥建设性作用,促进和支持那些目前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共同体和国家的经济增长。^⑥

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新发展动态其实已经演变为全球经济秩序转型的缩影,也是新型全球治理的有益尝试。世界需要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来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负外部性影响,并指导全球经济体选择正确的道路,进而融入到国际经济秩序的转型与升级中去。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领导人在许多国际多边场合都表示将努力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这种“领导”并非等于支配、等于自利、等于强制、等于包办。^⑦中国所提出的“协作领导”是在推动自身利益和他国利益实现共同发展形成的,而非霸权式的领导,并且避免了大国结盟。中国倡导的“包容性增长”理念,促进国际体系成员在不同文化、不同政治体制、不同发展模式的情况下,实现更高层次的合作,以期达到更高水平的共同进步。^⑧因此,面对亚太经济一体化所遭遇的障碍,中国不能以封闭对抗封闭,而必须推行更大范围的开放,要团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

① 关秀丽:“亚太自贸区构建进程的回顾与展望”,《宏观经济管理》,2017年第1期,第88页。

② 樊莹:“CPTPP的特点、影响及中国的应对之策”,《当代世界》,2018年第9期,第9-10页。

③ 黄河、高辉:“美国与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7期,第26页。

④ 秦法萍、帅军:“新形势下中国如何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年第4期,第131页。

⑤ 原倩:“萨缪尔森之忧、金德尔伯格陷阱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10期,第57页。

⑥ [英]奈瑞·伍茨著,曲博译:“全球经济治理:强化多边制度”,《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85-87页。

⑦ 陈志敏、周国荣:“国际领导与中国协进性领导角色的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3期,第15-34页。

⑧ 张雪滢:“国际公共产品与中国构建国际机制的战略选择”,《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8年第22辑,第267页。

家中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共同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开辟属于未来的新天地。^①中国在亚太经济一体化议题上的选择与做法具备在“后西方霸权时代”成为引领者的条件。世界需要

中国,中国更需要在构建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之中贡献中国智慧。^②

编辑 邓文科

The Change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nd the Path Selection of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and Trade Integration

HUANG He¹ ZHAO Lijuan¹

(1.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to the world economy and trade is self-evident.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e US, once an initiator of the multilateral free trade system, has begun to move toward the opposite of free trade. The fundamental reason lies in the law of imbalanced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t economy, which fundamentally restric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free trade policy. Changes in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will inevitably have a major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and trade integration. With reference to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 (FTAAP), it is noted that in pursuit of common interests, the driving force for cooperation in providing regional economic public goods will be even greater when there are economic motivation and commercial interests. In the process, China’s growing economic ties with economie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region determine that China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and make efforts to provide regional public good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in the framework of FTAAP.

Key words: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FTAAP; path selection; regional public goods

① 薛力:“‘逆全球化’不符合历史大势”,人民论坛网,2019年1月25日,<http://www.rmlt.com.cn/2019/0121/537880.shtml>。

② 于潇、孙悦:“逆全球化对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冲击与中国方案”,《南开学报》,2017年第6期,第88–95页。